

李大维 贾 稼

那里并不是天堂

中国列车文库

那里并不是天堂



北 京 文 学 出 版 社



中国列车文库

国列车文库

责任编辑：宋德顺

封面设计：方隆昌

那里并不是天堂

那里并不是天堂

《中国列车文库》编委会编

李大维 著

贾 霖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48开本 2.67印张 52,000字

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,5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482 定价：0.46元



目录

我从海峡对岸飞来

李大维

1

霓虹灯下的黑世界

贾稼

35

目录

我从海峡对岸飞来

李大维



一 我和我的家

我驾机起义回归大陆，在台湾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。有人说，我同台湾当局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，这话自有它的道理。因为，我在台湾的家是非同一般的，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“军人世家”。我父亲李鸿图，早年曾在戴笠手下做事，去台后先在国民党军五十八师任上校情报科长，后任阳明山警察分所所长，专门负责对张学良先生的“监护”。一九五二年，我才一岁，父母因感情不合分了手，母亲改嫁我现在的继父刘舜元。刘舜元是黄埔军校第十二期毕业生，今年六十八岁，曾任台湾南部地区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、总统府中将参军，现已退役，在台北当寓公。我岳父原先也是军统的人，曾任联勤总部政战部上校副主任；我岳母是军中雇员。我有些亲戚也是国民党的重要军人。我姨父曾在国民党军中干到少将副军长，他最要好的朋

友是现任国民党参谋总长郝柏村。我大妹妹的公公是已卸任的国民党陆军总司令、四星上将刘安琪。

总之，我这个家庭在台湾属于“上乘”家庭之列。我的父辈为国民党卖命一生，脑子里全是“为党国效忠”一类的思想，人们称之为铁杆军人。至于他们的子弟，也就是我们这一代，军人就更多了。我大弟弟是空军中尉，小弟弟在陆军官校读二年级，二妹是国民党政工干校艺术系毕业生，大妹夫在金门一个师里当炮兵指挥官。象我们这样的青年军人，正是国民党军队的骨干力量，用有些人的话说就是“主战力量”，是国民党竭力拉拢和争取的对象。这些人，或许和父辈一样，也会成为“铁杆”，至少也是国民党觉得可靠的人。

就我自己而言，在台湾青年军人当中又要算是佼佼者了。我一九六八年参军，陆军官校毕业后被分发到山寨训练中心受训，因成绩优异留在那里当教官。一九七二年，我报考陆军航空队，又以第一名的资格入选。学习一年飞行后，分到陆军总部航空队任飞行官，一九七五年升为上尉，一九八〇年升为

少校；一九八二年调到陆航一大队任观测中队分队长。我在国民党军中十五年，各方面都名列前茅，曾两次当选为“国军英雄”，受到蒋经国的接见。台湾的《青年战士报》还用很大篇幅介绍过我的情况，登了我的照片。

从另一方面来看，我有一个地位那么显赫的大家庭，用祖国的话讲，就是“高干子弟”了；我还有一个美满温暖的小家庭。内人毕德芸，三十一岁，毕业于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，现任“代安贸易公司”的经理，主要从事国际贸易。我们有自己的花园洋房，有小汽车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。我的月薪是二万六千元(新台币)，比台湾一般军人高出一万元。至于我妻子的钱，那就不好说了，她是个经理嘛。

这样的家庭环境，这样的人事背景，这样的生活条件，却出了我这样一个叛逆，台湾当局怎能不震惊呢？据说，在我回归大陆以后，台湾当局成立了一个专案组，专门调查我的情况。他们想知道我为什么抛弃优裕的生活条件，忍受与家人离别之苦，冒着生命危险，驾机飞回大陆。我想，这大概也是祖国同胞们希望知道的吧？其实，我根本不象

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，是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情。在台湾，我既有前途，也有“钱途”，真是什么也不愁的。何况妻子已在美国为我安排好了职业，等我今年退役之后合家迁美。但我认为人活着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和吃喝玩乐是极可耻的；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奋斗，不断追求，在于为民族、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。而在台湾，这种抱负根本不可能实现。我就是因此对台湾当局一天比一天失望了，最后，终于抱着寻求真理的决心，毅然飞回大陆。台湾当局也许会说，我这样做太对不起他们，我则认为是他们对不起祖国，对不起人民。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宝岛搞得那么乌烟瘴气，到处政治腐败、社会糜烂、道德沉沦，任何一个有良心、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能够容忍，我尤其看不下去。我之所以回归大陆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，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给台湾当局一个当头棒喝，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来唤醒台湾青年，以及和我有共同见解的人们，促使他们也早日行动起来，去寻求一条真正的出路。

二 我看台湾

今日台湾究竟是什么样子？这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。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。

由于我的家庭背景，我在台湾接触到很多高阶层的人，政界的，军界的，商业界的，警察界的，我都接触过。我对台湾的反感也就是首先从对这个阶层的认识开始的。首先谈谈台湾的政治结构。台湾的政治结构很奇怪。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国民大会，但这个大会从不进行改选，只搞所谓“增额”，国大代表和委员们都是三十几年前在大陆选出来，被蒋介石带到台湾的，人们讥为“万年国会”。每逢开会时，举目一片老朽，不是这个把假牙掉在地上，就是那个因找不到拐棍而无法行走。拥有一千张椅子的会堂，坐人不足四分之一。这些人平时不办公，不做事，开会时哼哼哈哈一下，从不提什么切实合理的建议。更可笑的是，现在台湾有“国大代表”

1112人，其中91人常住国外，不少人拥有居住国的居留权，有的甚至具有外国国籍。这些入了外国籍的国民大会代表，真不知道他们所代表的究竟是何国国民！而由他们所组成的“国大”，也真不知道究竟是何国的“国大”了！然而尽管如此，台湾当局却不敢解散它，因为台湾的总统要由这个国民大会来选；如果不是这样，而是让老百姓来投票，现任总统肯定会高票落选。因此，台湾当局要保住现任总统的宝座，就必须千方百计维系这个死气沉沉的机构。

至于地方政府（县、乡、镇、市），表面上说是自由选举的，实际上纯粹是贿选，换句话说就是用钱买官。当选者几乎清一色是有钱人，真正有才学、道德高尚、公正的人连边也沾不上。那些人为当官作了出血筒子，一朝权在手，就要大拼一把，于是利用手中的特权做生意，大搞特种经营：开色情理发店、按摩院、宾馆；开地下赌场；勾结官商围标……只要有利可图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正是这种恶势力与金钱的融合，使台湾政治变得腐败不堪。

政府是这样，执政党即国民党又怎样呢？

那更奇怪了。有人说，国民党建立的中华民国实际上从一九四九年起就不复存在了，而今在台湾更流行的一句话是：“国民党实际上也不存在了。”人们在谈论国民党时，总爱用一种讥讽的口吻，象谈笑话一般。难道这不是一个笑话吗？这样一个小集团，盘踞在几个海岛上，居然一再声称自己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拥有统治权。前总政战部主任王升每次向政工人员训话时，总是说：“同志们要好自为之。台湾小，你们无法施展抱负，将来回到大陆，你们每个人都要去管理一个省、一个市、一个军区。你们将成为县长、省长、司令……”真把人笑死了。国民党连自己都管不好，却妄言要管大陆，岂非痴人说梦？在台湾，还流行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国家在心上，国民党在纸上。”意思是，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已逐渐失去它的作用，因为人们普遍地唾弃它。很多国民党员到死也未参加过一次小组会，只要按期交纳党费就可以了。还有些人则是在进行所谓“选举”时才知道自己也是国民党的一员，因为那时会有些党工（专门做党务工作的人）跑到他们家里去，授意他们投某某人的票。

台湾政治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，国民党几十年来一直实行家族似的封建集权统治。马壁教授曾对台湾的所谓“三民主义”作了新的注解，其第一条便是“家族主义”。有一次，我听一位大学生说：“在今天的世界上，蒋介石是唯一成功地把政权交给儿子的人。”我听了受到很大触动。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认真想过，但我的父辈们早就有过类似的议论。我从他们口中了解到，蒋家的一贯用人标准是重臣不如家臣，家臣不如外戚，外戚不如血亲。再者，用奴才不用人才也是蒋氏传家的法宝。过去，就连宋美玲也有一个专属自己的装备精良的师，号称“美玲师”，升迁调动，驻防关饷，概出她一人之手，谁也休想过问。在台湾，海、陆、空三军官校的门口都有这样一条标语：“领袖、主义、国家、责任、荣誉。”“领袖”赫然排在第一位。蒋介石死后，蒋经国对官校学生们讲话时说：“领袖过世了，你们就是领袖留给我的遗产！”现在，蒋家的第三代也已纷纷窃据重要部门。蒋孝武、蒋孝勇、严孝彰、蒋彦士，都是台湾有权有势的人物。老百姓是这样形容他们的：“这些人举起手来，至少也能把天遮住一半。”

这些人里最引人注目的，是陆军总司令蒋仲岭。这个陆军官校第十六期的毕业生，资历极浅不说，且无才、无功、无德，又是搞通信起家的。有人做过统计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陆军总司令是通信兵出身，只有在国民党内才发生了这种奇迹。中国有句古话说：“一表三千里”。真是一点也不假啊！蒋仲岭就因为是蒋家的亲戚，所以从上校干到上将（国民党军最高军衔）只用了短短的十年时间。这又是一个奇迹。我认为，蒋家这样搞，实际上是在自掘坟墓。世界上最腐败的政治就是封建政治。我生长在台湾的所谓“上流社会”中，对这些东西看得很多，越看越生气，越感到窒息和愤怒。

说了台湾的政治状况，再说说台湾的社会状况罢。当今台湾社会，实在糜烂得令人寒心。我常听人这样说：“台湾是太平洋中污染最厉害的地方。”这是台湾社会状况的极真实的写照。上个世纪，荷兰人把台湾比喻成一口缸，缸里盛满清水，取其未开发与富饶之意；而今，这口缸里的水已混浊不堪了。

台湾的社会风气坏到了极点。

有人把这一点归咎于受西方的影响，我

认为有些片面和简单。台湾社会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步田地，是与它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的腐败息息相关的，从根本上说，则是由国民党的腐败所造成的。

概括地说，台湾社会有三多。

一是经济犯罪多。

台湾的社会制度是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“混血儿”，代表着官僚们和资本拥有者们的利益。这个利益是什么呢？可以概括为一个字：钱。台湾的整个国家机器都是为着钱而转动的。“有钱乃大”。钱意味着权，意味着一切。在台湾岛的每一寸土地上，都散发着冲天的铜臭。正因为如此，经济犯罪比比皆是，特别是贪污成风，高级官员贪污，中等官员贪污，芝麻大的小官也贪污，甚至连警察、税务人员和县政府的办事员也不例外。说实话，我非常同情后面这些人。为了生活，为了家庭，他们不得不这样。一个警察，月薪只有一万二千块钱台币。市区房租贵，郊区便宜一些，也要六千块。水、电、瓦斯费算在一起一千块。一家三口人，吃饭最节省也要四千五百块，这个水平在台湾算是苟延残喘了。台湾吃的东西多，

但价钱很贵，一斤青菜二三十块钱，一斤肉九十多块。小孩上幼稚园要交学费，中午吃点东西也得交钱。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应酬，红白帖子送来，一出手就是一千、二千，一个月来那么两三张，真能把人吓得脸都变黑。所以，这一万二千块钱，他怎么拨弄都不够，那就非贪污不可了。从另一方面来看，在那个社会里，要想办成一点事，不用钱做敲门砖是不行的。因此，“送红包”极为盛行，已成为台湾一大时弊，人们戏称之为“国习”。尽管当局三番五次下令制止，说这是“送臭包”，其实，每个人，包括当局的头脸人物在内都很清楚，谁也没有真心认为这包是臭的，相反，倒是官越大越喜爱它。

二是流氓多。

每一个初到台湾的人都会吃惊地发现，这里的治安状况差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：暴力事件无日无之，暴力手法不断翻新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犯罪目标日益政治化，使弥漫在台湾的暴烈之气更加浓郁。一位西方记者访问台北时，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：所有的楼房，五层以下全是铁门铁窗，平房就不用说了。只此一斑，已足可见出这是一